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 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 ( 8—11世纪 )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Nomadic Kingdom of Nine Tatars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A.D.

白玉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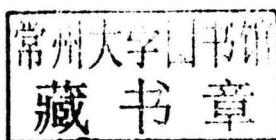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 ( 8—11世纪 )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Nomadic Kingdom of Nine Tatars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A.D.

白玉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姓达靺游牧王国史研究: 8—11 世纪 / 白玉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ISBN 978 - 7 - 5203 - 1512 - 8

I. ①九… II. ①白… III. ①游牧民族—民族历史—研究—  
西北地区—8 世纪—11 世纪 IV. ①K2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4989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王 琪  
责任校对 杨 林  
责任印制 王 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64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六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名单

## (一) 编委会

主 任：王京清

副主任：马 援 张冠梓 俞家栋 夏文峰

秘书长：邱春雷 姚枝仲 刘连军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宪群	邓纯东	王建朗	方 勇	史 丹
刘丹青	刘跃进	孙壮志	孙海泉	张车伟
张宇燕	张顺洪	张星星	张 翼	李 平
李永全	李向阳	李 林	李国强	杨世伟
吴白乙	杨 光	陈众议	陈星灿	何德旭
房 宁	郑秉文	卓新平	赵天晓	赵剑英
胡 滨	高 洪	高培勇	黄 平	朝戈金
谢寿光	潘家华	冀祥德	魏后凯	

## (二) 编辑部（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任：高京斋

副主任：刘丹华 曲建君 李晓琳 陈 颖 薛万里

成 员：王 芳 王 琪 刘 杰 孙大伟 宋 娜  
陈 效 苑淑娅 姚冬梅 郝 丽 梅 枚

## 序 言

博士后制度在我国落地生根已逾 30 年，已经成为国家人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30 多年来，博士后制度对推动我国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自 1986 年 1 月开始招收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起，截至目前，国家已累计招收 14 万余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已经出站的博士后大多成为各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这其中，已有 50 余位博士后当选两院院士；众多博士后入选各类人才计划，其中，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年入选率达 34.36%，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入选率平均达 21.04%，教育部“长江学者”入选率平均达 10% 左右。

2015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各设站单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服务体系，推动博士后事业科学发展。这为我国博士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

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在内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领域处于领军地位。为充分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创新积极性，展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优秀成果，提高我国哲学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联合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博士后成果。经过多年的发展，《文库》已经成为集中、系统、全面反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优秀成果的高端学术平台，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逐年提高。

下一步，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做好《文库》工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锐意创新、发奋进取。为此，需做到：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实践结合起来，愈来愈显示出更加强大的

生命力。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应该更加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继续把《文库》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展示、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二，逐步树立智库意识和品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回答时代命题、规划未来道路的使命。当前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愈发重视，尤其是提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从 2015 年开始，中央已启动了国家高端智库的建设，这对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针对性要求，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文库》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的博士后征集优秀成果，入选出版的著作也代表了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最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因此，要善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大智库功能与《文库》的小智库功能结合起来，进而以智库意识推动品牌意识建设，最终树立《文库》的智库意识和品牌意识。

第三，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里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缺失和建设问

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然是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概念、范畴和学科等组成。这一切不是凭空想象得来的，而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参考我们民族特质、历史智慧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吸纳儒、释、道、墨、名、法、农、杂、兵等各家学说的精髓，无疑是保持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重要保证。换言之，不能站在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立场搞研究。要通过《文库》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另一方面，要以中国自己的实践为研究定位，围绕中国自己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努力探索具备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在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方面，不断加强和深化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衷心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者和博士后们，以《文库》系列著作的出版为契机，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根本遵循，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时代的需求结合起来，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国家和人民的召唤结合起来，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是为序。

王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6 年 12 月 1 日



## 摘 要

九姓达靼是10—11世纪占据蒙古高原中部地区的游牧民集团。在探讨蒙古高原主体民族由突厥语族转变为蒙古语族的历史进程时，九姓达靼不可或缺。

第一，8世纪时期，室韦（即突厥鲁尼文碑文的三十姓达靼）部落的一部分位于色楞格河中游，可勘同为P. t. 1283文书记录的Ye-dre七族与Khe-rged族，以及回鹘汗国突厥鲁尼文碑文的九姓达靼。当时的九姓达靼隶属回鹘左翼，可视作三十姓达靼之一部分。回鹘汗国时期，突厥语族部落与蒙古语族部落之间的交界线，并不是在通常认为的蒙古高原东部，而是更为靠西。

第二，10世纪时期，九姓达靼占据着蒙古高原核心地带——杭爱山至图勒河流域，部分部落名称与见于《辽史》的阻卜部族名称、《史集》记录的克烈部及其分族名称相关。叶尼塞碑铭E59哈尔毕斯·巴里碑铭（Herbis Baary Inscription）记录当时的九姓达靼被称为“九姓达靼王国”。汉籍记录的以国王、天王娘子之名朝贡宋朝的达靼，并非“河西达靼”，而是“九姓达靼王国”。“九姓达靼王国”与北宋中央王朝保持直接的朝贡关系。

第三，敦煌出土P. 2741、P. t. 1189等文书反映，10世纪初期，鄂尔浑河流域的九姓达靼曾深入河西地区，并与甘州回鹘保持同盟关系。同时，九姓达靼亦与沙州归义军政权保持通使关系，并与回鹘商人及其故国——西州回鹘王国保持密切关系。虽然10世纪时期河西地区存在一部分达靼人，但这些达靼人属于达靼集团中的旁梢末端，其历史学意义无法与达靼本部相提并论。九姓达靼之历史与中国西北地区密切相关，应被视为中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 汉籍记录室韦—达靼人在 9 世纪初期移居至阴山地区, 但他们始终未能发展成该地区的主体部族。12 世纪初期出现的术语“阴山达靼”不应该上溯 200 余年。被李克用称为“懿亲”“外舍”的“阴山部落”之阴山不仅限于今日之阴山。“阴山部落”可视为追随李克用平定黄巢起义的达靼部落, 当指包括克烈部在内的九姓达靼。九姓达靼与沙陀后唐保持密切关系, 乃至姻亲关系。五代宋时, 漠北草原的历史进程与中原中央王朝直接相关。

第五, 达靼人向蒙古高原以西地区的移居, 反映九姓达靼与高昌回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叶尼塞碑铭威马特第九碑 (Ujbat IX) 记录 10 世纪时期九姓达靼曾与黠戛斯有过敌对关系, xj 222—0661.9 回鹘文书记录建国初期的高昌回鹘曾击溃九姓达靼。9 世纪后半叶的漠北草原历史进程是, 蒙古语族部落中, 九姓达靼最先开始向漠北移居。约在 9 世纪 70 年代, 北庭回鹘向漠北进军, 九姓达靼可能与其结为同盟共同对抗黠戛斯。其结果是, 九姓达靼在 9 世纪 70 年代末控制了蒙古高原核心地带, 同时与高昌回鹘保持着良好关系。

第六, 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Text Q 反映, 蒙元时期曾有突厥语族景教徒在该地区活动。上述 Text Q 题记出自当地的景教徒汪古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汪古人属于回鹘文字文化圈, 汪古部五大代表性集团渊流均与西域有关。10—11 世纪, 包括景教徒在内的西州回鹘辖下粟特系回鹘商人, 足迹遍及河西、陇西、漠北、契丹、宋朝内地等。景教在汪古部中的流传, 与西州回鹘辖下景教徒商人的活动和景教教团势力的向东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汪古部中虽包括部分沙陀突厥人与回鹘人之后裔, 但其统治阶层是出自西域的景教贵族。汪古名称可能源自回鹘语 öng “东方、前方”。

第七, 《突厥语大辞典》记录的古地名 Qatun Sini “可敦墓”位于哈密东, 纬度与哈密相同, 难以勘同为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上述 Qatun Sini “可敦墓”视为可敦城, 极具说服力。以《突厥语大辞典》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额尔齐斯河源头为参照物, 探讨 Qatun Sini “可敦墓”的地理位置, 其结论难言公允。昭君墓视作可敦墓, 存在名称上的龃龉与逻辑思维上的

本末倒置。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 Qatun Sini “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靼地内的镇州可敦城不悖于理。虽然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但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线，是从沙州经由漠北的于都斤与镇州可敦城后抵达契丹，反映的是 11 世纪初期的情况。

综上，本书着重对蒙古族先人室韦—达靼人向蒙古高原核心地带与漠南地区的移居，及其之后的成长壮大过程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其创新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8 世纪时期九姓达靼居地位于色楞格河中游，与汉籍记录的室韦部落居地相符。

第二，10 世纪时期的九姓达靼，其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王国”阶段，且与北宋中央王朝保持直接的朝贡关系。

第三，10 世纪时期的九姓达靼，除契丹外，还与五代宋、甘州回鹘、沙州归义军政权、西州回鹘黠戛斯保持互动关系。

第四，九姓达靼与沙陀后唐保持密切关系，甚至于姻亲关系。

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现，有望学术界能够对“阴山达靼”“河西达靼”等提法重新进行定位。更重要的是，五代宋时期，九姓达靼曾归附于沙陀后唐，直接朝贡宋朝，并与河西地区保持有密切联系。这说明，当时漠北草原民族的兴衰与中原中央王朝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的漠北草原历史，是中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九姓达靼 叶尼塞碑铭 敦煌文献 突厥鲁尼文 回鹘文

## Abstract

The Nine Tatars was the nomadic group who occupied the central region of Mongolia plateau from the ten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Mongolian ethnic group was the Mongolia plateau main ethnic which changed from Turkic ethnic group,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Nine Tatars was indispensable.

First, during the eighth century, a part of Shiwei (室韦) (i. e. the Thirty Tatars in the Orkhon Inscriptions) tribe was located in the middle part of Selenga River, can be identified as Ye-dre seven clans and Khe-rgeḍ clans in the P. t. 1283 D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 and Nine Tatars in the inscriptions of Uyghur Khanate in Turkic Runic Script. At that time, Nine Tatars was subordinate to the Left Wing of Uyghur Khanate, could be regarded as a part of Thirty Tatars. In Uyghur Khanate period, between Turkic tribes and Mongolia tribes, the boundary was not usually thought of the eastern Mongolia plateau, but more on the West.

Second, during the tenth century, the Nine Tatars occupied the core area of Mongolia plateau, i. e. from Khangai Mountains to Tuul River valley, the names of some trib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s of Zubu (阻卜) tribes in Liaoshi (辽史), and the names of sub tribes of Kereit was recorded in the Jami'al-Tarikh. Nine Tatars was called "the Nine Tatars Kingdom" at E59 (Herbis Baary Inscription) in the Yenisei Inscriptions at the time. In the Chinese records, the Tatars in the names of King and Tianwang Niangzi (天王娘子) (täŋri elig täŋrim, i. e. Khatun) who paid tribute to the

Song Dynasty, was not the Hexi Tatars but the Nine Tartars Kingdom. The Nine Tatars Kingdom kept the directly tribu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rthern Song central dynasty.

Third, according to the P. 2741, P. t. 1189 and other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early tenth century, the Nine Tatars in Orkhon River was deeply entered Hexi (河西) area, and kept the alliance with the Uyghur Kingdom of Ganzhou (甘州). In the same time, the Nine Tatars kep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uiyi Army of Shazhou (沙州), and kept the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ancient Uyghur merchants and their homeland, the Uyghur Kingdom of Qocho (高昌). Although there was a part of Tatars in the Hexi area during tenth century, but these Tatars belonged to the tip of the Tatars group,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ould not be compared to the Tatars headquarters. The history of the Nine Tatar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orthwest of China,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urth,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Documents, Shiwei, i. e. Tatars migrated to the Yinshan (阴山) area in the early ninth century, but they had never been able to develop into the main tribes in this reg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welfth century, the term of "Yinshan Tatar" should not be the inverse of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Yinshan" in the term of "Yinshan Buluo" (阴山部落) which was called by Li Keyong (李克用) "Yiqin" (懿亲) and "Waishe" (外舍) was not limited to today's Yinshan. "Yinshan Buluo"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atar tribe who followed Li Keyong to quell Huang chao (黄巢) uprising, referring to the Nine Tatars including Kereit. Nine Tatars kept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hatuo Later Tang (沙陀后唐) dynasty, and even kinsmen by affini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Song Dynast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directly related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Fifth, Tatars migrated to the west of the Mongolia plateau, which reflected the Nine Tatar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yghur

Kingdom of Qocho. In Yenisei Inscriptions, Ujbat IX Inscription recorded the Nine Tatars had hostile relations with the Kirghiz (黠戛斯, Xiajiasi) Khanate in tenth century. The Uyghur Kingdom of Qocho had defeated the Nine Tatar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early days which was recorded in xj 222 – 0661. 9 Uyghur manuscrip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was that the Nine Tatars of the Mongolian ethnic group firstly migrated to it. About 70s, Beiting (北庭) Uyghurs campaigned to the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and the Nine Tatars may be allied with it to be against Xiajiasi Khanate.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Nine Tatars controlled the core zone of the Mongolia plateau at the end of 70s ninth century, in the same time, who maintained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yghur Kingdom of Qocho.

Sixth, old Uyghur Inscriptions Text Q in the White Pagoda of Hohhot (呼和浩特) reported that Turkic Nestorians had appeared in the are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above mentioned Text Q was most likely wrote by the local Nestorian Onggud tribes. The Onggud Tribes belonged to the old Uyghur cultural circle, five representative groups of Onggud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 Tenth to eleventh century, including the Nestorians, the Sogdian merchants of ancient Uyghur were ruled by the Uyghur Kingdom of Qocho, their footprints were all over the Hexi area, Longxi (陇西), the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Khitan and the mainland of Song Dynasty. Nestorianism spread in Onggud, who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tivity of the Sogdian merchants of ancient Uyghur were ruled by the Uyghur Kingdom of Qocho, and the Nestorian forces developed eastward. Although Onggud including part of Shatuo (沙陀) Turks and the descendants of old Uyghurs, but the ruling class was from the Nestorianism nobil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name of Onggud could derive from the Uyghur öng “east, front”.

Seventh, Qatun Sīnī “Khatun tomb” was located in the east of Qamīl (哈密) that recorded by Dīvānū Luġāt-it-Türk, the same

latitude as Qamīl, it couldn't be identified as the tomb of Zhaojunmu (昭君墓)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Hohhot. Mr. Zhang Guangda (张广达) regarded Khatun tomb as Keduncheng (可敦城) "Qatun City", this point was very persuasive. The circular map in *Dīvānū Luġāt-it-Türk* marked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Ötükān, it took the source of Irtysh River as for reference to discuss Qatun Sīnī Khatun tomb's geographical position, its conclusion could hardly be fair. This point that took the tomb of Zhaojunmu as Khatun tomb, which existed discord on the name and had the order reversed on the logical thinking. It was not contrary to science that took Qatun Sīnī, which had been fighting with Tangut, as Zhenzhou (镇州) Khatun City (可敦城) in Tatars of the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Although there was a pathway that connected Khitan to Xixia and Qarakhanid, the traffic line from Qarakhanid to Khitan was recorded by the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which was from Shazhou to Ötükān and Zhenzhou Khatun City in the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then arrived at Khitan. It reflected the condition in the early eleventh century.

In summary, this book focused on the Mongolian ancestors Shiwei—Tatars' migration to the core area of Mongolia plateau and the South of the Gobi Desert, carded and texted the later growth process of it. Its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1. During the eighth century, the Nine Tatars located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Selenga River, in accord with the Shiwei tribes' residence in Chinese record.

2. During the tenth century, the Nine Tatars' social development had reached the "kingdom" stage, and maintained direct tribu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entral Northern Song Dynasty.

3. During the tenth century, except Khitan, the Nine Tatars maintaine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Five Dynasties, Song Dynasty, Uyghur Kingdom of Ganzhou, Guiyi Army of Shazhou and the Uyghur Kingdom of Qocho.

4. The Nine Tatars maintained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Shatuo

Later Tang Dynasty, and even maintained relation by marriage.

I hope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can make the academic circles reposition the Yinshan Tatars and Hexi Tatars. More importantly,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Song Dynasty, the Nine Tatas attached to Shatuo Later Tang Dynasty and tributed directly to the Song Dynasty, remaine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exi area. This shows that at that time, the rise and fall on nomadic tribes of the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is an organic part of China history.

**Key Words:** the Nine Tatars, the Yenisei Inscriptions, Dunhuang Manuscripts, Turkic Runic Script, Uyghur Script



## 凡 例

1. 本书脚注所引用文献，初次出现时标明全部信息。第二次以后，只标明作者与论著名、页数。

2. 族名 Tatar 相对应的汉字有“达鞑、达坦、鞑鞑、达旦、达怛、鞑怛、达达、塔塔”等。除史料用词外，本书以“达鞑”为准。

3. 引用突厥鲁尼文史料时，转写（transcription）中，: 代表碑石所刻停顿符号，斜体字为见到残余笔画文字，黑体字为根据残余笔画的推定复原文字，下横线表示未被刻写的元音文字，//表示完全破损文字，大写文字与原字表示未能转写的文字。译文中，（ ）内文字为补充说明，[ ] 内文字相当于推定复原部分，\*表示未能判读或释清的破损文字。

4. 引用回鹘文史料时，转写中，: 为原文中的停顿符号，（ ）内文字代表书写时被省略的元音，[ ] 内文字为见到残余笔画文字或推测复原文字，下方加一个圆点文字表示需要改读文字。未按行录文的史料中，上标小数字表示行数。译文中，（ ）内文字为补充说明，[ ] 相当于见到残余笔画文字或推定复原文字，\*相当于未能判读或释清的破损文字。

5. 引用汉文出土文献史料与碑刻史料时，[ ] 表示个数不明的缺损文字，□表示能够确定个数的缺损文字，□内文字为推测复原，（ ）内文字为紧前面文字的补正，未按行录文的史料中，上标小数字表示行数。

6. 相关年表与地图、图版等插于文中。

7. 年代标记，遵循如下原则：与中国史或汉文史料直接相关的，按中国史朝代年号记录，初次出现时后附公元纪年。其他以公元纪年表示。

8. 引文作者敬称一律省略。